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11 期 (总第 361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卷首语/就这样被你感动

要目

●本期专题/纪念建党九十华诞

党史未解之谜：中共成立时多少党员 多少为国捐躯

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外媒：与时俱进让中共保持旺盛活力

西方政党领袖和专家：

中共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强大领导力

●国是论衡

中共 90 年：

谁不是遍遭“九九八十一难”方修成“正果”

●政坛经纬/官员“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人物春秋/邓小平：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就这样被你感动 大可

九十年，就这样被你感动。满目疮痍，祖国凄风苦雨。水深火热，人民痛不欲生。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们凭借信仰穿越二万五千里；我们坚持八年抗战，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奏响“三大战役”的凯歌，将老蒋赶到了那座小岛上；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火纷飞，血雨腥风，共产党人中倒下了无数精英，他们以五千年长夜中亘古未有的荣光使历代风流人物黯然失色。多少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天边的云霞，多少革命先烈的躯体铸就了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

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李大钊舍生取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献出了自己的六位亲人；做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完全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写出六大惊人之“无”：【第一“无”】死不留灰；【第二“无”】生而无后；【第三“无”】官而不显；【第四“无”】党而不私；【第五“无”】劳而无怨；【第六“无”】死不留言。谁说共产党人没有高风亮节？张闻天三让总书记，毛泽东称其为“明君”。共产党人不是做官，是做事，开国少将甘祖昌，解放后三次申请回家做农民。上甘岭战场上的一句承诺，泰兴的刘绍安老人却为此坚守了半个多世纪，他离家50多年，甚至都没能为自己的母亲送终。

在南京市雨花台东侧有一条安静的小路，叫丁香路。一位名叫时钟曼的80岁老太太，讲述了一段关于丁香路的凄美爱情。“这条路是为了纪念一个叫白丁香的女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白丁香女士和乐于泓先生。1925年，丁香和阿乐相识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当时正值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两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秘密婚礼。没过几个月，丁香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北平参加秘密会议。不久，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年12月3日子夜时分，丁香在雨花台牺牲，时年22岁。阿乐听到丁香牺牲的消息，一个人在雨花台拉了一夜的二胡，从此独身了18年。”这个凄美的红色传奇也感动了老人，老人嫁给了故事的男主人公乐于泓先生

这样的红色记忆，这样的人生传奇如灿烂星河。在血与火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广阔胸怀，引领各族人民，团结各界人士，终于写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辉煌篇章！

九十年，就这样被你温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是胜利了，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严峻任务。

共产党人不负众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日益繁荣富强；华夏游子归来，两弹一星成功发射，神舟一冲飞天；邓小平“一国两制”，香港、澳门相继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举世瞩目。“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在坚韧的求索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敢于正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党成功了，成熟了。

九十年，就这样被你鼓舞。回眸党史，90年的奋斗，90年的求索，90年的沧桑，90年的巨变，鲜红的党旗始终飘扬在我们奋斗的前方。有了你的英明领导，有了党指挥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希望。在战争年代，革命先烈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和平年代里的雷锋留给我们做人的真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年仅二十二岁就同中国共产党永恒的青春连在一起。

九十年，九百年，九千年，历史启迪未来，无数后来人会被你感动，会被你温暖，会被你鼓舞……在你的蔚蓝色的天空中，我只不过是划过的星星一颗。

●本期专题/纪念建党九十华诞

党史未解之谜：中共成立时多少党员 多少为国捐躯

从50多名到8000多万，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秘密组织到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90年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奇迹。

波澜壮阔的90年，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已被载入史册。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慷慨激昂乐曲声中，也有一些至今难以辨认的音符，梳理这些党史上的未解之谜可以发现：昨天的未知，对今天与未来，却是深刻的启示！

中共成立时到底有多少党员——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1956年，中共成立35周年之际，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重访“一大”会址，泼墨挥毫写下八个大字——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而今，到“一大”会址参观的人面对这八个遒劲大字，在无限感慨的同时禁不住探究：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究竟有多少党员？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表述：“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

“50多名党员”，这也是人们在相关资料中常见的表述，至于具体人数党史界一直有争议，有53人、57人甚至59人等多种说法，至今未有定论。

最早的版本是“53人”：1921年11月，中共在致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有“53名党员”，但这份报告并没有具体名单，新中国建立后研究者分别列出的名单又不完全相同；“57人说”来源于1928年中共“六大”，当时的一份统计表记载，“一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为“57人”，但后人根据57人所列的名单又有很大出入；此外，张国焘还提出了“59人说”，也因为没有具体名单而得不到核实……“由于史料保存不全，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很大出入，所以学界存在较多争议。”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说。

历史也许能无限接近，却难以还原。中共成立时全国党员人数的具体差异，在今天看来已无碍大局；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刚成立时数十人发展到8000多万党员？从最初主义纷呈、党派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进而改写中国历史？这才是今人应从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需要思考探究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1921年7月22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记者发现“新青年丛书出版广告”，列出了《社会主义史》等六本书的简介以及著者、译者，其中不乏沈雁冰、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员的名字。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前一天，上海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马克思’（也就是马克思）的名字，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为自己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说。

历史是现实的向导，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回望90年，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的根本，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一个坚定的声音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巨轮，驰过惊涛骇浪，高歌猛进。

历史启示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新机遇和新挑战，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担当领航中国的重任！

有多少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为国捐躯——不怕牺牲，虽死犹生

在上海的龙华烈士陵园，有一个无名烈士墓，集体安葬了271名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在井冈山斗争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平均每天有50多位烈士倒下，铭刻在烈士名录上的只有15744位，有3万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为执政党的28年间，凡是留下红色足迹的地方，都有烈士陵园，而几乎每个烈士陵园，都有无名烈士。“要精确统计有多少共产党员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比较难，因为牺牲巨大……”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齐卫平说。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为了建立新中国，全国有2100多万革命者捐躯，而各地烈士在册记载的只有160多万，有1900多万革命先烈名字无法确认——他们中间，有多少共产党员，倒在血与火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饱含深情，尝试在逝去时光中找回无名烈士的名字。

记者在贵州遵义采访时发现这样一个故事：当地有一座家喻户晓的红军坟，坟前有一座高大的铜像——一位女红军卫生员正在给怀里骨瘦如柴的孩子喂药。铜像前，香火不断，铜像的脚背，已被前来瞻仰的人们触摸得光滑发亮。

从1935年开始，人们口口相传：红军当年离开遵义时，一位女军医因为给群众治病而掉队，结果被敌人杀害。群众将她掩埋于此，年年虔诚祭奠，称之为“红军菩萨”，甚至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小红”，并排练成舞剧《红军魂》，搬上了舞台。

“坟里究竟埋葬的是我的哪位战友？”得知这个传说后，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五师军医老红军钟有煌，一直想揭开这个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致函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对“红军坟”里卫生员的“性别”的疑问，并介绍了红十三团最后撤离遵义时发生了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为农民看病而没归队的情况。遵义有关方面十分重视，多次派人到北京访问这位老红军，并根据他所提供线索，在当地群众中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由此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失踪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龙思泉终于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虽然，关于他的信息十分有限，只知道他是广西人，曾参加过百色起义。

今年96岁的老红军王道金至今还记得，当年过草地时沿途都有红军战士的遗体，不少人至死仍保持着前进的姿势，成为后续部队壮烈的路标。王道金说：“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敢于牺牲的精神！”

回溯中国共产党90年，不同历史阶段，入党誓词不一样，但都有“不怕牺牲”方面的内容。如今的入党誓词就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年代不同，环境不一样，但共产党员敢于牺牲的精神没有变。正是一代代敢于牺牲的共产党人，甘于奉献，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启示未来：今天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党员干部面临的生命危险已然减少，但诱惑却骤然增加。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共产党建立了多少革命根据地——民心向背，执政之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反抗风起云涌，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模式迅速传播。

中国共产党究竟建立起了多少农村革命根据地，至今仍然没有确切数字，成为一道未解之谜。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梁星亮分析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处于拉锯战，今天这块根据地夺回来了，明天又丢掉了，确实很难统计。

“无法确切统计当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数字，恰恰说明了根据地生存的艰难，国民党军队数量、装备都占绝对优势，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企图‘杀死’、‘饿死’红军。”梁星亮说，“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红军怎么可能建立起那么多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沦陷，留守红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当时，国民党军队企图“竭泽而渔”，强迫群众搬出大山。没想到群众利用每月初一、十五进山砍柴的“开禁日”，自发带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捡。后来敌人发觉了，对上山的群众进行搜查。他们又用新方法，把挑柴的竹子打通，装上米、盐等食物，丢在山上，下山时重砍一根竹子挑柴回去……陈毅为此赋诗铭记：“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正是因为对人民群众态度不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必将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在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中，陕北根据地尽管处于国民党大军合围之中，却始终没有失去。梁星亮分析说，群众支持，是陕北根据地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转战陕北期间，共产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如有神助，而国民党军队成了瞎子、聋子，接连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而沙家店一战后，陕北局面被彻底改变。

“根据地的群众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把群众真正当成了亲人。”梁星亮说，他多年来致力于陕北根据地研究，对一件往事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住在延安杨家岭的时候，听说有位村民家里穷，孩子娶不上媳妇，他就亲自做媒，并让中央办公厅帮助扎花轿，去迎新娘……

就在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迎来了一批批学员，《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课程是最让学员震撼与深思的一门现场教学课，他们在革命旧址追思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热烈讨论：新时期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做群众工作？

历史启示未来：在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史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始终没有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始终没有丢。永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6月26日“新华视点”记者 汪金福 肖春飞 刘敏）

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 90 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5 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 90 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 月 20 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 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

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 1993 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 GDP 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 10 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南方周末 6 月 23 日作者：记者 陈中小路 实习生 徐燕燕】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从 1921 年到 2011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波澜壮阔的 90 年，既是世界历史大变动的 90 年，也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 90 年。与世界历史大变动紧密相联的中国历史大变动在广度、深度上，在由此引起的冲击力、震撼力上，实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所仅有，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这 90 年，中国开头是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今天则是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开头是国家瓜分豆剖、人民积贫积弱，今天则是国家团结凝聚、人民充满希望；开头是饱受蹂躏、任人宰割，今天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这 90 年，中国相继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这 90 年历史大变动由何而来？综观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在于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并且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领导核心；有了一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够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和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持续获得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心骨和领路人。这个领导核心，这个主心骨和领路人，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 90 年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新觉醒，是党的指导思想真正能够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各项历史性课题、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获得新解放并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福祉的新觉醒。

回溯 9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获得了哪些真正能够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呢？

第一，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状况，对 1840 年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判断，鲜明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这个具有极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第二，提出鉴于中国特殊国情以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经过民主革命，尔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战略观念。在此基础上，搞清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也只能由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根本战略方针。

第三，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由此又提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时期，还实行对一部分抗日的大资产阶级也加以联合、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第四，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大革命。同时，进一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实行“党指挥枪”。

第五，提出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农村环境下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特殊艰巨性，需要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项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第六，经过延安整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第七，新中国成立后，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引，有步骤、分阶段地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经过空前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刻指出我国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工作路线、工作方针上的拨乱反正，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种种严重失误特别是“文革”教训，进一步确认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由此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性、纲领性的基本命题。与此相联系，确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确认直到 21 世纪中叶即 2050 年以前中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十一，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进而发展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尔后又提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十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立足时代特点和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三步走，即依次经过解决温饱问题、奔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尔后又把从 21 世纪初中国进入“小康”后到 2020 年的这 20 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第十三，面对 21 世纪全球性挑战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第十四，通过把国内大局同国际大局结合起来、把国情意识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清醒估计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前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独创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纪之交，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进入 21 世纪以后，进一步强调清醒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对的必须紧紧抓住而又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全方位地拓展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十五，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使自己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此同时，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第十六，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上这十六点归结起来，集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在 9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动中获得了在以下五个根本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心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反对任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二是进行什么样的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中心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变，而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民主革命只能靠资产阶级领导”的陈腐公式和混淆革命阶段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妄想。三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心点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中心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五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心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无视人的全面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掠夺式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成功实践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从而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一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属于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创立的、具有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性质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论等，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二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启动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回答，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并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界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历史方位，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三是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围绕这个部署，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两次飞跃”，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关于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特征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等，都属于在发展问题上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既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上述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之每一方面，都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开始即明确提出，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和深化，并且总是与 30 多年各个具体阶段党的总体战略布局相联系而构成统一整体。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创造，归根到底都同这三大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分不开。

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排除“左”、右干扰，思想解放不断上台阶，有力带动了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不断上台阶；反过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又有力促进了思想的再解放。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党指导的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而不是相悖反；党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党坚持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党的十七大达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这就是：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的鲜明体现和最新成果，从而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远未完成，中国还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还需要在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开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艰苦奋斗近 40 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不同思潮相互激荡，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这种情况，必然会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带来多方面复杂深刻的影响。从更加长远来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总之，面对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国共产党清醒估量困难，同时清醒坚定地把握历史方位、历史机遇和历史进程之主流和主导方面，把信心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既不断推进历史大变动，又不断实现自身新觉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与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加强党自身团结与加强党和人民团结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人民日报 6 月 23 日。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外媒：与时俱进让中共保持旺盛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 90 周年之际，这个执政党在群众中获得了强大的支持，其党员数量激增至 8000 万，超过法国的总人口。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足迹渐消，但在中国，领导层作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明智决定，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而且这个国家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上拥有 90 年历史的政治党派寥寥无几，而年届九十却还能够保持如此活力的政党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 90 年的惊人变革之后还能保持如此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总能与时俱进。

中国教育部最近一份调查结果表明，近 80% 的大学生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准备于 7 月 1 日庆祝其成立 90 周年的中共来说，这将是巨大的推动力。140 所高校的 2.5 万余名学生接受了此次调查。

由于把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年轻精英聚拢在自己这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党派能够高枕无忧地对社会上的年轻人产生影响。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九成的受访者对这个国家对诸如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作出的反应以及在海地和巴基斯坦的国际救援行动感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诸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以及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等国际盛事也是体现中国完美领导的突出事例。

89.6%的受访者对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带领这个国家迈向更大的繁荣表示乐观。

中国共产党将于 7 月 1 日庆祝其成立 90 周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中共的成就归功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周，习近平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在革命时期、国家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中共都很好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中共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共敞开了一些最有权力、最秘密的部门的大门。其中之一就是被视为中共自上而下组织结构核心的“中组部”。中组部控制着党内干部的任命、调职和升职，并掌握着党内人员的机密个人档案。中组部成立于 1924 年，第一任负责人就是毛泽东。

上周，中组部第一次向驻华外国使节开放。十多名外交官了解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选拔过程。中组部还向他们介绍了其如何对高级官员（例如商务部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进行教育和培训。在另一个层面，中共正越来越多地接触外国学者，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在会见外国学者时说，中共愿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开展与包括学界在内的国外各方面人士的交流。刘云山积极评价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在帮助外界全面客观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努力。（新华国际）

西方政党领袖和专家：中共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强大领导力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90 华诞前夕，西方多位政党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领导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中国崛起得到世界广泛认同，但西方目前尚难理性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随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增加，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执政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欧洲左翼党前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90岁的中国共产党依旧生机勃勃，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政党”。历史上，中共善于学习和把握自己的未来，她没有跟随、盲从苏联模式，而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斯基认为，中共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只要中共继续不断学习，作出正确的发展决策，鼓励各行业的创造性，就将一直保持其引擎地位。

欧盟智库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的格林·福特教授说，中共做到了与时俱进，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甚至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尽管中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也还会面临诸多挑战，但英国共产党委员会中央委员基斯·贝内特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像过去90年总能战胜危险和困难那样，在未来有能力破解各种难题，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前驻华大使顿乔·顿切夫说，中国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同时还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且能提出很多新思想的国家，正在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所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兰表示：“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最近20多年在教育、大学、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象征着未来。”

法兰西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汉学家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也认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勇于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省。她总结中共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大国身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二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普及了初等教育，推广高等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素质；四是广泛传播科技知识，使科学技术为群众所知、为社会所用；五是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增加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六是发展信息技术，开放互联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知识传播。

开创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帕乌诺夫认为，中共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才会在经济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看看过去20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开创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通过推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有效克服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惯常遇到的问题，发展成就显而易见”。

帕乌诺夫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失败的经济试验”。实践告诉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改革，都必须有稳定的政治体制。中共在经济方面所做的事情世所罕见，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上是学不到的。

对比中国与前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塞尔维亚共产党主席、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孙子约瑟普·约什卡·布罗兹介绍了他的认知和感悟。他说，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发展壮大，而南斯拉夫却衰落、分裂：“今天，我们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民主并非万能的药方，如果盲目地照搬别国的民主，到头来只会陷入政治混乱，甚至是无政府状态”。

约瑟普说，中共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中共是为了人民而非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中共的执政经验将更加丰富和完善。这值得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党学习。

保加利亚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亚纳基·斯托伊洛夫说，中国发展的连续性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把发展、改革与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试验，实现的是一种渐进、浪潮式的发展，此种模式以政策的连贯性和平衡性见长。

斯托伊洛夫分析说，中国模式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共有望完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丰富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精神文明的完美结合。

在多极化世界发挥独特作用

德国政治学家、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认为，在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中国发挥着独立自主的、增长迅速的作用，是一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一股制衡力量。美国、欧盟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一个公平、合作的秩序，没有霸权，相互理解。中国崛起对构建多极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欧盟著名智库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皮埃尔-德弗雷涅说，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需要更多时间才能适应和接受。

欧洲学院院长保罗·德马雷说，如果中共要在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与时俱进，希望中国今后更加虚怀纳言，倾听人民的心声，当然来自人民的批评并非没有边界，批评本身也要遵循一定规则。

挪威工党总书记雷蒙德·约翰森以挪威工党自身经验向中共建言：为了真正建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政党，中共宜加强与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交流与互动，时刻密切关注基层民众的动向。

帕乌诺夫建议中共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更多地介绍自己的经验。他说，今年年底将在希腊雅典举办第13届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希望中共届时能更多讲述自己政策的细微之处，特别是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此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中共自身建设问题等，也都是外界感兴趣的话题。

核心挑战是跟上社会发展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未来学家雅克·阿塔利认为，中国需着力解决社会基础设施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使国家机构运作更加透明和民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沈大伟表示，中共领导集体已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党政军系统已经完成了系统的更替。党政机构正在吸收年轻官员，实施了提高干部能力和忠诚度的各类在职培训计划，并已基本取得成功。但腐败等问题仍长期存在。中共领导人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使中共作为执政党跟上社会发展，以及启发和带领国家走上新的方向。

托马斯·迈尔认为，一党执政最重要的是，执政党须努力做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党内都能发挥作用，公共讨论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洛塔尔·比斯基对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示认同。他表示，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从不将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思维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比斯基称，中共的未来在于吸取以往教训，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以人民福祉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经济学家裴天士表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中国在保持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每年需解决 2000 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政府只能提供 900 万到 1000 万个就业岗位。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的平衡，中国同时需要在农村创造 2000 万左右的就业机会。

裴天士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度依赖外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若要继续保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国还需要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逐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梅格德·弗朗茨认为，中国的核心领域和国家银行坚决不能对外开放，这是一项重要保证。从长远来看，中共要把一些重要的合资企业逐步“收归”国有，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欧洲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艾伦·亨里克森也表示，一些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等地显示出较浓的“重商主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修建铁路，还应该为世界作出更多实质性贡献，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同。

保持稳定实施渐进式改革

雅克·兰认为，中国的体制与欧洲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单一政党，其组织形式也非常特别，无法与欧洲的任何政党进行比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有力和团结的政党，并渗透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当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非常特别，并不存在政治更替。

玛丽安娜·巴斯蒂一布吕吉埃认为，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人能力较强。中国社会的更多问题出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怨言较多。如何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方法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央领导对地方进行短期视察，对于发现或敦促地方改正问题有一定帮助，但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引入机制，建立相关机构，来监督制衡地方政府。特别是可考虑引入新的评价官员政绩机制。比如可引入“群众满意指数”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以改变官员只对经济数据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

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共执政首先强调的是稳定，这一点应得到尊重。只有实现了稳定，才有发展、自由和进步。稳定也意味着融合包容，吸引和鼓励人们参与，社会越不同、越多样化，越能够赢得稳定。通过人们的参与和讨论，取得思想观念的认同，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要求公民参与。

迈尔表示，中共内部也在实行改革创新，如党内和政府一些重要职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外部也有科学顾问或者智囊为中共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这些创新的因素将进一步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受欢迎程度。

针对美国学者章家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谢淑丽等悲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将出现西方式民主制度或制度崩溃的论调，沈大伟表示，中国不会出现西式民主或制度崩溃，在未来 10 年或 15 年中，中国共产党可能需要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可能会采取两种途径：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地位，从而形成体制内的某种制衡，赋予“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中国共产党将会逐渐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空间”，尝试改善体制内外的沟通和协商。

关于政治改革的路径，沈大伟认为，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共最有可能实施渐进式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体制正在形成，中国将会成为“兼收并蓄型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将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外国实践和本土实践，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政治体制。

● 国是论衡

中共 90 年：谁不是遍遭“九九八十一难”方修成“正果”

前进的智慧，向上的力量，常蕴于先行者的足迹和历史的辙印。

建党 90 周年之际，研读党史，在感慨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之艰苦卓绝、革命先辈奉献牺牲之慷慨激烈的同时，不禁思索：假若没有漫漫 90 载的非常历程、峥嵘岁月，没有一场场存

亡抉择、生死考验、血火淬炼，没有一次次失败挫折、艰辛探索、奋斗拼搏，而是一路走来
顺风顺水、平畴坦陌，还会不会有如今这个自强不息、生机勃勃的大党？

磨难出英雄，忧患创伟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于90年的节点上蓦然回首，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视野中，处处是可歌可泣的“非常之观”：从上海租界的石库门、南湖上的一只小船、“八一”起义的枪声、“地球上的红飘带”到天安门城头的庄严宣告，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从“98抗洪”、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到迎战金融危机……

非常之观，源自不懈之跋涉。古往今来，世事如登山，若非历尽险、远，则难觅“非常之观”。如果说“险”首先鉴判的是勇气、胆识和气魄，那么“远”则更多地考验信念、意志和能力。在历尽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提醒自己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要求自己“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积90年只争朝夕的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震撼和启示。非常之观，贵在自觉之砥砺。90年来，中国共产党改造着中国社会，也不断改造着自己。以“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的学习和实践迈向知识爆炸时代，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修正错误、把握方向，以“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的清醒认知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惟其如此，党才能在诡谲的波光中不为所惑，在变幻的风云里立场坚定，在大好的形势下开拓前进，在骤至的危机前奋发有为。一个永不自满、永不停滞的执政党，焕发着无限活力和能量，始终立于时代的潮头、走在民族的前列。

非常之观，始于经常之忧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类历史上，举凡建立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者，谁不是遍遭“九九八十一难”方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崛起于民族救亡历程，又引领新中国走过了无数的封锁、禁锢、危机、灾害。每一项巨大的成就、每一次可喜的进步，无不伴随着复杂的挑战、探索的艰辛、改革的阵痛，从困境中不断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总是从困难中想办法、在灾难中谋进步。苦难与辉煌，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深深地融入了党的血脉之中；坚强与奋发，使党带领饱经风雨洗礼的中国走出了历史的悲情，抒发着迎来复兴的豪情。

“韬厚喷薄沧海上，直将浮蔽作华裳”，90年风起云涌，90年波澜壮阔，90年的光辉篇章凝结着历史的沉思，也将夺目的光芒照进现实。“行百里者半九十”，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出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继续创造更为壮美的“非常之观”。无限风光在险峰，更在未来。（人民日报6月23日朝明）

官员“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政府一时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

翻开报纸，转发微博，评论新闻……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宜黄强拆”，这些借助媒介迅速蹿红全国的符号提醒我们，今天，治理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介呈现、传播甚至放大，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新闻发言人不断亮相，越来越多党政干部回复留言板、走进直播间，1700多个政府机构微博随时发布权威信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聚光灯越来越自信自如，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

当然，变化是一个过程，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媒介意识的淡薄。或是躲避媒介，“杞人忧钴”、“响水逃城”等事件，暴露引导手段的缺失。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

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

●人物春秋

邓小平：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的。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一盏多么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邓小平！这个不朽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在五洲四海到处传颂。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这位以自己的深情热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东方老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征程。

他的身躯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老党员”、“老公民”，多么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内涵的称呼啊！

“我自从 18 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是很平静的。他已经 80 岁了，而 1922 年时，他才 18 岁。当时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起点，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相当愉快，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别山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终于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站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巍然屹立的中国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 10 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绪是很复杂的。工作繁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者还能不做事？芽”只是在 1956 年到 1966 年他出任总书记期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织，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力。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 1977 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

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复出了！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 20 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曾三次讲“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980 年 8 月，邓小平这样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對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他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邓小平一生中很少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功绩，也不喜欢别人为他树碑立传。1926 年他在莫斯科写了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所谓的检查材料，也仅仅是如实地介绍历史情况，他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章，即便是在退休后和很多老同志“随便聊聊天”，也是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历史，认为这些“值得回忆啊！”而很少讲到自己。这一点，在他同意大利记者前后 8 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也被对方敏锐地感受到了。女记者问他在回答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的老革命家时“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70 多年的革命生涯，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有时被他短短的几句话就轻松地一掠而过。23 岁时当中央秘书长：“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 岁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开始干军事这一行”；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跟着走”；抗日战争独自在太行山主持战略区工作时：也是“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情很不平静，是啊，为革命孜孜不倦奋斗了60余年，现在休息了，这该是人生中一个多大转折啊！他说，退休就要真正地退休。他的家人也衷心地希望他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健康长寿。邓小平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而开始为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3年，他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位“老党员”、“老公民”用自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继续奋斗着。

“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9月，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下来，足以使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

邓小平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很放心，也很高兴”。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沉着应付，艰辛开拓，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

“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香港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中充满着无限深情和热切希望。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邓小平早年曾去过5次。

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袖们，一直为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不懈地努力着。香港“租期”一步步走近了。毛泽东等未及解答的这道历史难题由邓小平等着手解决。从8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多少年来，邀请邓小平去香港的人不计其数，但都被这位日益年迈的老人婉言谢绝了。他不是不知道，尽管香港回归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但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话来说，也“一年比一年困难了”。能尽早目睹香港是这位东方老人梦魂萦绕的夙愿。但是，他不去，原因不言自明。香港回归以后，再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是难以言状的。

“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声音，激促了中华大地上空滚动着加快经济发展的阵阵春雷。但是，他在深圳面对着香港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讲。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里，他深情地望着对面的香港。在皇岗口岸，他站在边境久久地凝视着对面的香港，目光不愿意离开。那饱经人世沧桑脸上的神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使陪同的人终生难忘。

此时此刻，我们再倾听这位伟人简明、质朴的自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怎能不心潮逐浪，难以自己呢？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令世人悲痛的日子不幸到来：1997年2月19日21时8分，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邓小平的遗体上，这是党和人民给予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荣誉。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自己的后事，近年来曾对亲属多有交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

笔者曾几次到过邓小平抗日战争时住过的河北省涉县（原为河南省）赤岸村。那里的人民群众把附近一道小山岭起名为将军岭，专门留几处地方，用来埋葬当年曾在此地战斗过的一辈革命家的骨灰，以此来缅怀他们的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刘伯承、徐向前、李达、黄镇均有骨灰埋葬在此，当地民众们也希望小平同志身后将部分骨灰埋葬在此。恩格斯的骨灰是放在盒里漂浮到大海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周恩来、刘少奇的骨灰是撒向大海中的。

邓小平生前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后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而第一次见到大海，他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本文摘自《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作者：赵晓光、刘杰，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